



世纪前沿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美】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政权与斗争剧目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政权与斗争剧目

〔美〕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权与斗争剧目/(美)蒂利(Tilly, C.)著;胡
位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ISBN 978-7-208-10782-3

I. ①政… II. ①蒂… ②胡… III. ①政治斗争-研
究-世界 IV. ①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5227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陆智昌

政权与斗争剧目

[美]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4
字 数 247 000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782-3 / D · 2092
定 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政权与斗争剧目

前言

眼看着襁褓中的孤儿长成了翩翩少年！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我一同参与了2001年出版的《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一书的写作。在此合作过程中，我特别承担了有关政权体制(political regimes)的研究工作——斗争政治与政权体制如影随形(并常常与之敌对)，但是，我有关这一领域的主张，不仅未能与两位合作伙伴的主张取得一致——他们追求一种更加唯意志论的以及行动者中心主义(actor-centered)的分析路径，而且也让已有的文本——已在他俩思想的重压下不堪重负——徒增篇幅，甚至更加趋于复杂。为此，我们最终决定从合著中抽走所有有关政权的论述。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若增加这些篇幅，将使《斗争的动力》难以卒读。当然，我的这部分研究也随之被分离出了这个家庭。

从此孑然一身，好在一息尚存。政权体制问题是我后期从事的大部分研究——包括有关集体暴力、显性政治认同(visible political identities)、民主化以及社会运动的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突出主题，是斗争的剧目形式(repertoires)，即一种地方性的、为人熟知的、在历史中形成的、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在大多数条件下由投身于斗争政治中的人们自行界定和发挥的斗争手段。尽管从常规领域的政治活动到政治团体之间的暴力行为，斗争剧目始终厕身其间、反复呈现，但是，这对孪生姐妹——政权与斗争的剧目形式——却有其自己的运行轨迹。长期以来，冲突与集体行动的研究者在斗争形式的变化和变异与政权形式的变化和变异的衔接问题上所提出的主张都颇为片面，无论他们是否采用了这两个术

语。鉴于此，我将界定两者的关系作为这部著作的中心议题。

本书并不旨在对一切政权、一切斗争形式，以及存在于政权与斗争形式之间的一切关系作出普遍性的论述；相反，本书的主题相当集中，即集中探讨以下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权的变化和变异是如何对这一政权形式下斗争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产生影响的？哪些因素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政权形式下斗争政治所呈现出的重大不同？反过来，斗争政治的过程又是如何改变政权形式的？

本书对一些萦绕以往著作的问题不再深究。譬如，这里的“政权变异”主要探讨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方面的差异，而不再论述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已在我早期有关国家转型、革命以及民主化的著作中有所阐释。此外，本书也不再探讨诸如经济组织、人口动态、文化变迁等对斗争政治条件下的政权变化产生影响的其他相关因素。就此而言，本书仅对斗争政治中的变化和变异进行部分而非全面的阐释；对于各类政权之间的差异，本书的阐释也有所侧重。本书着力探讨的是政权组织与斗争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可否认，政权与斗争形式依然属于“斗争的动力”一族。为了避免再度衍生出一部过于复杂的著作，我极大地压缩了有关机制、过程和事件的论述——这些已在《斗争的动力》以及随后发表的作品中论述过了，而侧重于对政权与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作出更具有普遍性的阐释，既不——列举其间所有的因果关联，也不再对事件进行系统的比较以便论证这些关联。当然，本书的基本假设依然与《斗争的动力》一脉相承：

- 对大型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来说，任何形式的普遍法则和充分条件都是不存在的。
- 我们可以认识和辨明革命、民主化等政治过程的必要条件。
- 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al analyses)与个案比较(case comparisons)能够有效地厘清哪些需要我们作出阐释，但是，它们不能代替阐释；因为这两种分析路径均从结果追溯前提，而未能对前提与结果之间的各种因果关系作出界定。

- 恰当的阐释有赖于对上述因果关系链中的机制和过程作出界定。
- 不过，唯有那些对机制和过程的组合和顺序产生影响的因素，才被列入阐释的范围。
- 因此，对大型的社会过程所作的充分而恰当的阐释，展现了恒定机制(*invariant mechanisms*)的各种组合和顺序是如何在不同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下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结果的。

我将上述假设视为本书的出发点，无意再对其进行论证。本书有关政权与斗争相互关系的分析，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作出检验。

经授权，我从拙著《持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中摘录了数页有关南非的论述，并从拙文《政权与斗争》(*Regimes and Contention*)中摘录了数页内容。此外，书中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来源于或改编于我以往的研究成果，当然，它们绝非简单地裁剪和粘贴，譬如，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本书第七章有关法国示威活动的分析与拙著《集体暴力的政治》(*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中的相关论述无甚差异，但实际上，这一部分吸收了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 2004 年的研究成果——即巴黎人自 1975 年以来所开展的各种示威活动的相关分析——因而确乎有所更新。但愿读者们能够从这种连续性中获得乐趣，而不至于因为某种似曾相识而心生厌倦。

衷心地感谢亚当·阿什福斯(*Adam Ashforth*)、马克·拜辛格(*Mark Beissinger*)、米格尔·森提诺(*Miguel Centeno*)、米凯尔·埃里克森(*Mikael Eriksson*)、洛塔·哈伯恩(*Lotta Harbor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道格拉斯·米切尔(*Douglas Mitchell*)、西德尼·塔罗、彼得·沃伦斯廷(*Peter Wallensteen*)、莱斯利·伍德(*Lesley Wood*)、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本书的匿名评审人，感谢他们的建议、批评、提醒和鼓励；同时，也感谢戴维·贝梅尔曼斯(*David Bemelmans*)在编辑方面所赐予的富有洞见的意见。米格尔·森提诺和西德尼·塔罗对书稿提出了强烈批评，但我只是略微作了修订——这些温和的改动恐怕难以令其满意。无论如何，唯愿本书能给上述益友和同道中人带来些许的启示和挑战。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何谓政权 / 1

第二章 政权如何运作 / 22

第三章 斗争剧目 / 35

第四章 剧目遭遇政权 / 72

第五章 变化的轨迹 / 107

第六章 集体暴力 / 140

第七章 革命 / 179

第八章 社会运动 / 213

第九章 结论 / 248

参考文献 / 256

译后记 / 278

第一章

何谓政权^{*}

秘鲁，印加帝国的中心，16 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区域内的一颗钻石，它的白银和黄金甚至为远到中国的贸易提供过财源。1824 年，秘鲁独立。尽管起步时颇具前景，但此后的历史却麻烦重重：一个一个的政权接踵而至，一场一场的政变纷至沓来；这个国家常常沦落于不同派系的军人之手，而在军人的背后则伫立着外国的资本势力。光阴荏苒，直到 20 世纪的后半叶，秘鲁犹豫不决的民主化才蹒跚起步。

秘鲁的民主化是带着非民主(nondemocratic)的气息起步的。1968 年，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将军以秘鲁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场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他实行了一套颇具秘鲁特色的拉美民粹模式：放松了对诸如成立工会等的限制，同时对非正规定居者(squatter settlements)和非正规定居地给予法律认可。不过，这些让步适得其反，反而让反对者们更加团结，并为走一步看一步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Collier 1999, 115—119; Mason 2004, chap. 9)。在此后的十余年里，秘鲁又经历了两场剧烈的政权更迭，直至 1980 年才算迈入了平稳、正规的民主治理时期。不过，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激烈的斗争与冲突依然一如既往地持续着，这些斗争与冲突将文职官员、军队大佬、有组织的工人、原住民、城市贫民以及有组织的反叛者们裹挟其中。

^{*} 英汉辞典常将 regime 译为“政体”，但在政治制度理论中，“政体”一词专指“最高治权”的法定归属，即最高治权归于个人的君主政体、归于特定集团的寡头政体、归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体。鉴于此，本译本取 regime 的政权体制之意，译为“政权”。——译者注

民主治理在这个国家从未步入乡村。直到1988年，秘鲁高原仍流淌着内战的鲜血。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对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1988年，“光辉道路”领导人阿比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接受了利马一家报纸的专访，这是他近十年来的首次公开露面。声名显赫的《年鉴》(*Annual Register*)杂志对这次专访作了如下报道：古兹曼闭口不谈奥斯曼·莫罗特(Osman Morote)于近期落网，而是——

大谈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声称：“在人民战争之既定步骤的指引下，我们正在迈向光辉的顶峰。”随后，他又补充道：“我们将不得不为起义做准备，而这些起义将会夺取和占领城市。”今年5月，在一个未被标示的墓地发现了5具尸体，从而证实了传闻中的屠杀——政府军曾在萨雅拉(Cayará)屠杀了28个村民。不过，起初尚且对此暴行表示不满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总统，不仅最终拐弯抹角地替政府军作了辩护，而且还越来越坚信他理应辩护。(*Annual Register* 1988, 80—81)

此时，反政府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Tú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正在群山中与政府军武力对抗。1989年，“光辉道路”在首都利马组织和发动了多起罢工和袭击事件，甚至迫使加西亚总统宣布首都戒严(Burt 1997)；与此同时，恶性通货膨胀也在啃噬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如是又过了15年。在此期间，秘鲁发生了一系列蔚为壮观的体制性变革。这个国家在1989—2003年间所经历的各种斗争和冲突，向本书提出了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譬如革命、罢工、战争、社会运动、军事政变等——是如何与一类政权向另一类政权的转变发生交互作用的？斗争政治的转变与政权体制的转型如何互为因果，又在何种程度上互为因果——譬如，极端暴力必然与骤然

爆发的政权变革相伴生吗？

上述问题出现在当前有关民主化的研究中，并伴随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群体团结一致是发生民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主只可能在阶级统治与大众抗争的相互较量中诞生。与此同时，上述问题也出现在政治分析家们对社会运动是否（或在何种条件下）促成民主，以及稳定的民主是否能够消弭或驯服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出现在基于另一个视角而展开的对民主是否趋于避免彼此的争战的研究中。总之，至少在逻辑上，上述问题出现在对大众政治所作的每一份历史阐释中。

上述问题同样出现在有关劳资冲突的研究中。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罢工以另一种形式表明了边际效益最大化之追求模式的溃败；第二种观点认为，罢工是劳方对于资方的妥协，它不知不觉地将工人阶级整合到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第三种观点认为，罢工是竞争资本主义体系而非其他体系中的一种理性而必要的斗争形式。上述每一种观点都延续着有关革命的研究路径，都无一例外地将诸如特定的斗争形式是否必然促成革命、革命是否必然衍生特定的斗争形式等问题纳入考量范围之中。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形成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以衔接政权变革与斗争政治；也就是说，我们尚未对这一问题——即大众所采用的主要的抗争形式是如何随着一类政权向另一类政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和变异的——作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逻辑上一脉相承的、经验上无懈可击的解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变化和变异是如何发生的作出解释了。就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而言，目前至少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是政权变革与斗争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附条件的（contingent）和变动不居的；二是迄今所做的梳理——无论是对政权的变革还是对斗争政治的变化——均未获得广泛的认同。

显然，政权与斗争政治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是附条件的：一方面，就政治角色的相互关系而言，许多关系并不具有外在的斗争性：譬

如，政治角色按部就班地履行义务、缔结联盟、达成交易、分享伙伴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等；另一方面，斗争政治既不必然以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al agents)为中心，也不必然地专注于主要的政治角色——以罢工为例，在矿工与雇主的斗争中，警察或政府官员往往只起着监督现场和维持秩序的作用。鉴于此，本书不打算探寻政权的每一个层面或斗争政治的每一个方面，而只是对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作出解释。

为了将两种复杂的现象——政权和斗争——衔接起来，我们必须作出相当精细的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聚焦于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和具有因果关联的关系。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缺乏系统的分析路径以应对这一挑战。研究者们通常是在议会民主的框架之下，在专制政权面对革命的苟延残喘之中，在军队高度自主致使政变频发的体制下观察(往往作狭义解的)社会运动的集中迸发的；与之相应的是，对政权所作的研究也大多零星散布于诸如工业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罢工，或是大地主所有制下的农民反叛等大同小异的议题。由此可见，我们缺乏坚实的普遍框架用以解释不同类型的政权体制下，斗争政治在形式上和动力机制上所发生的变化。

现有的研究模式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譬如，对存在于斗争政治的过程与斗争政治所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双向交互行为缺乏关注，尤其是当斗争政治为特定类型的政权(如极权主义国家)所激发，而所激发的斗争政治又进而促使政权发生转型时，有关其间过程的研究更是尚付阙如。即便就解释层面而言，现有的研究也未能形成一以贯之的认识：譬如，未能在有关常规政治的研究和有关斗争诉求的研究之间建立联系。此外，现有的研究也极少对政权与斗争政治的结合作出动态的因果阐释。

本书旨在对政权与斗争政治之结合作出动态的因果解释。以下是本书涉及的主要问题：

(1) 政权是如何变化和变异的？

(2) 在不同类型的政权体制下，普通民众向其他民众或向政府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集体诉求——即斗争政治——的方式是如何变化和变异的？

(3) 以政权的变化或变异为一方，以斗争政治的性质为另一方，在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双向的——联系？两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程度如何？

在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层次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秘鲁在 1989—2003 年的斗争政治历程不仅显现了秘鲁的独特性，而且，也显现了政权与斗争政治交互行为中的一般规律。

回到秘鲁

在探寻可资利用的分析工具以应对这些难题之前，我们先回头谈谈秘鲁。我们将通过细致的观察来认识秘鲁政权与斗争政治之间的诸多关联，并进而对所要阐释的内容作出界定，对所要探索的范围予以澄清。

经历了十年内战的洗礼，1990 年，阿兰·加西亚总统相对民主的民选政府结束了任期。选民们寻求变革。在庞杂的总统候选人中，有两人脱颖而出并进入了最终的角逐：一位是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另一位是数学家、秘鲁国立农业大学校长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闻名国际的略萨与秘鲁的精英群体结为同盟，而藤森则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毕竟，藤森的移民父母只是学校看大门的。藤森反对略萨的自由市场政策，他发誓坚决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紧缩政策。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代表作为《世界末日之战》(*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译者注

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回忆录《水中鱼》(*Fish in the Water*)中,这位作家描绘了自己在面对藤森的支持狂潮时的错愕之情,他强烈怀疑加西亚的军队之所以秘密地转而支持藤森,是为了阻止自己当选所要引发的“灾难”——一场预期中的政治整肃。尽管如此,直至投票正式开始前两周,略萨依然保持着信心:

我想,藤森可能获得的选票——这些选票试图打垮我们——不太可能超过总票数的百分之十,选票将主要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军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选民。除此之外,还有谁愿意将手中的选票投给这样一个人:此人不被公众了解,没有自己的管理团队,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资历,竞选活动从未超出利马,只是经过一夜的临时准备而仓促成为候选人的。无论民意调查怎么讲,在我们近三年的巨大努力面前,我不认为这个缺乏创意、缺乏正规团队的人能够翻出什么花样。(Vargas Llosa 1994, 459)

然而,藤森却赢得了24%的选票,仅次于略萨29%的得票率,屈居第二。不过,两人都未能获得第一轮选举所需的半数选票。在一番令人筋疲力尽的角逐之后,藤森以57%对34%的优势当选秘鲁总统。到底是“特定的军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选民”说了算啊。尽管在其民粹主义的竞选中信誓旦旦,但藤森一旦走马上任即着手废除国家补助、推行公共服务私有化,并力促扩大国际贸易。此外,他还提出了一项动议——任命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Vladimiro Ilyich Montesinos)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项任命当时并不引人关注,却给藤森此后的总统任期打上了烙印。

这项任命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弗拉迪米罗·伊里奇·蒙特西诺斯,1946年出身在阿雷基帕(Arequipa)的一个左翼家庭,其姓名中的“伊里奇”即源于他的父亲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尊崇。不过,这位共产主义的叛子逆臣着实与他的共产主义前辈们背道而驰。

蒙特西诺斯曾在巴拿马和秘鲁的军事院校受训，随后在秘鲁军中任炮兵中尉，后又被迅速地提拔为梅尔卡多·哈林(Mercado Jarrin)将军的副官。1973年，哈林就任秘鲁总理和三军总司令，时年27岁的蒙特西诺斯开始私自搜集军政要员的各种信息，开始了其从事非法和半非法活动的生涯。

1976年，蒙特西诺斯伪造总统签名，将自己派往美国执行任务。他并不将自己视为秘鲁政府的代表，而是向兰德公司和中央情报局大肆提供秘鲁的军事情报。秘鲁军方严肃处理，军事法庭以极不光彩的罪名对他提出指控并判处一年监禁。蒙特西诺斯在狱中自学法律，给自己买了法学学位和律师资格。出狱后他执业为被控偷税漏税和被控贩卖毒品的被告提供辩护。与此同时，他与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国家情报局(Servicio Inteligencia Nacional)——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90年总统选举期间，反对派指责藤森的妻子在一桩房地产交易中偷漏税款。在秘鲁情报局头子的引荐下，藤森委托蒙特西诺斯担任法律顾问，偷税漏税的指控随之烟消云散(观察家们认为蒙特西诺斯同样摆平了藤森的出身问题，竞选期间曾有证据显示藤森出生于日本，并不具有参选秘鲁总统的资格)。实际上，尽管尚无正式的头衔，但蒙特西诺斯已然成为了藤森的情报主管。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甚至特别就两人的关系提交了一份题为《谁控制谁》(Who is Controlling Whom?)的报告(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0)。在蒙特西诺斯的指点下，藤森迅速与军队高层建立了同盟，他架空了国会和法院，处处安插别有用心之人，随时准备抢班夺权，同时对左翼分子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打击。当然，在美国的支持下，藤森也力图实现秘鲁的经济复苏。

截至2000年，秘鲁国家情报局每月可创收八九百万美元，其财源有三：一是财政预算，二是政府部门的私下交易，三是蒙特西诺斯保护伞下的军火和其他非法贸易(McMillan and Zoido 2004, 76)。此外，有传闻称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向蒙特西诺斯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换取其对美国反毒品斗争的合作。蒙特西诺斯将数百万美元存入自己的瑞士账